



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

主 编 / 郑 开
副主编 / 任传斗

齊魯書社



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

主编 / 郑开
副主编 / 任传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 / 郑开主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8. 9

ISBN 978-7-5333-4025-4

I. ①齐… II. ①郑… III. ①稷下学派—研究—IV. ①B22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1364 号

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

QIWENHUA YU JIXIAXUE LUNCONG

郑开主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编 250002

网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刷 山东金坐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60 千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4025-4

定价 48.00 元

稷下黄老学的兴起与其 作为秦汉主要思潮的时代特色 (代序)

陈鼓应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稷下黄老学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流落民间,使学术思想渐趋普及而造就热络的学术气氛,加上各国竞争日烈,才智之士争相提出治世之说,百家争鸣态势业已形成,而这尤其集中在齐国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中。据徐幹之言,稷下学宫乃齐桓公田午所设:“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中论·亡国》)至齐宣王、齐愍王时期,稷下学达到巅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据《史记》所载，稷下先生有七十六人，其中有姓名可考者六人，而这六人中即有四人是“学黄老道德之术”，黄老学者在稷下学宫中占了主导地位。

黄老学兴盛于齐有其历史渊源。所谓“黄”指黄帝，“老”指老子。^①姜齐是炎帝的后裔，故田齐取代姜齐后，齐威王便明确宣称是“高祖黄帝”，以和姜齐有所区别；田齐是陈国公子完的后人，老子亦为陈人，两者有相同的地域思想之背景。田齐与黄帝、老子的特殊渊源，提供了黄、老思想合流及黄老学成为稷下显学的有利因素。

稷下黄老思想的内容，大抵保存在稷下学宫汇编之作《管子》之中。其中，《管子》四篇（《内业》《白心》《心术上》《心术下》）可说是稷下黄老的代表作，此外，《形势》《宙合》《枢言》《水地》等篇也富有黄老色彩。《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君臣分职、君逸臣劳，“无为而制窍”的统御术，是稷下黄老对老子“无为”概念的重要发展，并深远地影响着秦汉的统治思维。

黄老学在稷下先生们交相谈辩之际，也影响着各家的发展，并散播到三晋、秦、楚各地。例如，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

① 王充《论衡·自然》：“黄老之操……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

的荀子,其学说中“虚壹而静”的“大清明”之心,就富有黄老思想的色彩,三晋法家人物更是多“学本于黄老”,秦国《吕氏春秋》更以黄老思想为主体,甚至对《易传》中的《彖传》《系辞》也有深刻的影响(可参考拙著《易传与道家思想》)。诚如蒙文通先生所言:“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①黄老学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

二、稷下黄老学作为秦汉主要思潮的时代特色

“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是向齐国君王献策的智囊团。因此,黄老学作为老子之后道家发展的重要分支,不同于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庄子学,展现出对政治的高度关怀。从黄老思潮的发展来看,在战国时代,《黄帝四经》道、法合流,《管子》四篇礼、法并重;至秦汉之际,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将老子的“无为”发展成“主逸臣劳”君臣分职的君王南面之术,《十二纪》与《天文训》吸收阴阳家并具体化为明堂时令之学,群体汇编之作应合着秦汉大一统的时代需求。至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提到,六家“同归而殊涂”,“皆务为治者也”,但黄老学何以能在百家争鸣中压倒百家呢?司马谈总结黄老道家的特质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黄老思潮不断吸纳各家所长以因应时代所需,正是黄老学在秦汉之际一枝独秀的关键因素。

^① 蒙文通:《古学甄微·略论黄老学》,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76页。

黄老思潮对老子学的发展,有几项独特之处。首先,从修身来看,主张“神本形具”,强调修身为治国之本,并以“君体心位”之说一理贯通了修身与治国之道。再者,由治国来看,主张“虚无为本,因循为用”,“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具体来说,在典章制度上表现为礼法并用,在统御原则上采取“指约而易操”的策略,通过“君臣异道”(“君无为臣有为”)达致“无为而无不为”的实效。

黄老思潮的发展,通过“黄老之学”落实为汉初“黄老之治”,达到了最高峰。尔后,虽然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离开了政治舞台,但其思潮仍转入民间持续酝酿发酵,对东汉黄老道教的出现,乃至魏晋主张调和儒道的王弼与郭象之思想,都持续发挥着绵延不绝的影响力。

目 录

稷下黄老学的兴起与其作为秦汉主要思潮的

时代特色（代序） 陈鼓应/1

稷下学宫在教育史上的创新与超越 王志民/1

驸衍在战国秦汉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影响 葛志毅/17

齐文化与黄老思想的核心精神 陈丽桂/33

试论齐文化在当今公共财政体系构建中的

启迪意义 宣兆琦/69

论齐学的超地域性 苗润田/84

《汉书·艺文志》《管子》入道家辨 巩曰国/97

《礼记·月令》与“齐学”的关系 丁 鼎/114

21 世纪全球性视野下的齐鲁文化 金白铉/130

宇宙的统一性与道德的超越性	陈 静/143
从王道看孟子的民本主义价值观	李振刚/160
“亘”与“亘先”	丁四新/176
“黄老道”杂议	郭 武/203
由《国语·齐语》《管子·小匡》中的“官人”术说到 清华简《芮良夫毖》相关文句的渊源与解读	宁镇疆/224
道家黄老学派及其文献:以稷下学为中心	郑 开/237
解经与治国	李若晖/266
《淮南子·兵略训》对齐兵家思想的继承	刘爱敏/286
“身”“乡”“家”“国”“天下”之同异	张丰乾/308
桓管变法与《管子》“礼法兼综”思想之形成	陈佩君/330
含藏与因循:“裘明”所见《老子》治道的变迁	苗 玥/356
论《管子》与“管子学派”	黄一洲/369

稷下学宫在教育史上的创新与超越

王志民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院长)

稷下学宫是集学术、政治、教育为一体的思想文化中心。长期以来学术界十分注重对其学术贡献、地位的探讨和挖掘,从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其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中,单列《稷下通考》,首句即云:“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既则齐之稷下。”^①其后对稷下的学术活动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在诸子百家争鸣中地位、贡献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经过长期研究,在许多方面达成学界的共识,例如,认为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中心,是诸子百家争鸣的主阵地,其相容并包、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等。稷下为满足齐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设,历代学者对其政治性质也早有论述和关注。例如,《新序·杂事》中即说:“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子荀卿列

①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68页。

传》中则记载说：“自驸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然而，对稷下教育性质的探讨以及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贡献、地位的研究是薄弱的，既缺乏深入，也存在歧见。例如，在稷下研究史上影响巨大的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就说：“齐国在威、宣两代，还承继着春秋末年养士的风习，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①他又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②在这里，郭老在充分肯定了稷下学宫在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的同时对稷下的教育性质实际上提出了质疑。

一、对稷下学宫教育性质的再认识

笔者曾较多地查看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所涉稷下学宫者很少，甚至有的教育史著作未曾提及稷下学宫^③。近三十年来稷下学宫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大家逐渐关注到稷下学宫对教育史的贡献，但是，即使在对战国时代教育的研究中，关于稷下学宫的研究、探讨仍然是薄弱的，是与其地位不相称的。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7 页。

②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8 页。

③ 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看来,要探讨稷下学宫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首先要深入探讨稷下学宫的教育功能。即对学宫社会历史功能主体的认定是大学堂,还是研究院或政治参议院?如果是大学堂,那么它与早于稷下一百余年孔子兴办私学的伟大创举相比,有什么意义和贡献?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稷下学宫就其主体社会功能看,与后世对其称为“学宫”的认识是一致的,即主要为教育性质的机构,它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大学堂;是在战国时代礼贤下士的文化背景下,将养士之风导向官办大学的伟大教育创举。从中国教育史的发展角度看,它传承、革新了传统的官学教育,与孔子创办私学一样,都是空前伟大的创举。而它与孔子私学相比较,既传承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精神、方法甚至制度、规则,又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创新和超越。稷下学宫被建设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大学,并与学术研究创新和为政治现实服务紧密结合,成为后世大学最早的雏形。

应当承认,田齐统治者创办稷下学宫的目的,并不是大办教育,甚至也并不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其意图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的,是要“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它是政治的需要。但稷下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效能,使它实际上成为一座以教育功能为主体,将培养人才、学术研究争鸣、为现实政治服务融为一体的名副其实的大学堂。说其是以教育功能为主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具有大学的基本要素和条件

1. 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和优越的基础设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该处记载虽简略，但透露出很多信息：一是学宫经过了精心的选址。《左传·昭公十年》记载：“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杜预注：“稷，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庄，六轨之道。”《释宫》云：“六达谓之庄。”《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可见，学宫是建在都城内直通稷门的最宽阔大道之上。二是有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校舍建筑群。“高门大屋”所述虽简，已显建筑的宏伟；司马光《稷下赋》描述为：“筑钜馆，临康衢……高门横阓，夏屋长檐，樽壘明洁，几杖清严。”可见其设施的豪华。

2. 有众多师生居间教与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三进稷下，时长二十余年的孟子，周游列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战国策·齐策》中，齐人称田骈是“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钟，徒百人”；而稷下的前辈学者淳于髡去世后，“诸弟子三千人为之缗经”（《太平寰宇记》卷十九）。由此可见，各派学者生徒之多，学宫之中，师生人数之众。如此之多的师生济济一堂，讲学、讨论、研讨，其盛况是可以想见的。学宫也定期举行大型学术辩论会，刘向《别录》记载有“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谈说之士，说明参加者广泛，并不限学派范围。

3. 有一定的管理系统和规章制度。虽然，由于历史数据的

缺乏,我们很难系统描述学宫的管理情况,但荀卿曾在稷下“三为祭酒”,说明当时学宫不仅有总管之校长,而且,既然是“三为”,说明担任了三个任期,这就证明稷下学宫是有定期任命或考选制度的。上文所引“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既说明有定期集会的规定,又显示出管理上的井井有条。根据郭沫若等学者的考订,认为《管子·弟子职》即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①其中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下温习,从尊敬师长到品德修养,都制定了具体严格的规定,可看作是一套较齐全的学生管理制度。这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较完备的学生守则,它成为后世官学、私学、书院制定学则、学规的范本”^②。由此可以想见,稷下学宫应该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教学管理制度的,只是由于历史久远,又加秦火的毁灭,我们今天难以见到全貌罢了。

(二)三位一体,以学为主

稷下学宫展现出了学术、政治、教育的多重功能。但教育教学应是其活动的主流和社会性质的主体,这是不难理解的。试想,各学派大师带领生徒而来,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在这数千人汇聚的学宫,生徒是绝大的群体,教育活动若非主体是难以想象的。

①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通:《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956页。

②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经过数千年岁月的淘涤,我们从有限的文献中所能看到的稷下学宫,主要是其学者留下的大量学术遗著及参与政治活动、学术争鸣的言行、事迹和故事,记载教教学育人事迹的资料相对缺乏,但这并不能否定稷下的性质主要是“学宫”,是一个充分发挥着教育功能的机构。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到刘向对稷下学宫性质的见解。刘向是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古籍整理文献学家,他受汉成帝之命率领群儒对汉代中央馆所藏先秦至西汉的古籍进行的大规模典校整理,是对中华文明传承的巨大贡献。刘向领校群书,又具体负责诸子、经传、诗赋类的主校,因而,对战国诸子百家著作、事迹的考察研究尤为深入和精到。可以说,刘向是对稷下学宫和战国诸子百家做过最全面考察研究的人,他在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著的《别录》中对稷下学宫的性质曾作了很明晰的表述:“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太平寰宇记》卷十八)从学宫所具有的教育因素看,无疑,刘向的见解是正确的。

(三) 办学特点, 游学为主

与传统的官、私学相比,稷下学宫的确有其特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它以游学为主,实行开放办学。所谓游学,就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既可以像荀子那样“年十五始来游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属独自一人来求学;又可以像孟子一样“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

人”(《孟子·滕文公下》),即带领众多生徒同来游学。当然,像淳于髡、田骈以及到稷下之后的孟子、荀子等,在学宫内广招生徒,开展教学活动也是大有人在的。所谓开放办学则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家学派,来者不拒。不计立场,不以好恶,不论出身,愿者即来,一律欢迎;二是来去自由,不设藩篱。以博大胸怀,礼贤下士;以开放心态,管理学宫。这些特点,固然与战国之时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分子的时代风气有关,也是田齐统治者创设稷下学宫时在理念和管理上的创新之举。

怎样理解学术、政治与学宫教育为主体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三重功能是有机的和谐地统一于一个整体的。首先,为政治服务是其教学目的。在那样一个政局瞬息万变、列国纷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学者的教育实践和学术活动为主体,通过为统治者培养大量人才来实现的,而其学术功能,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与教学实践活动、思想的传承发展以及各派之间的教学相长、研讨交流有直接的关系,最终使稷下学宫成为兼具学术研讨争鸣及为现实政治服务功能的高等教育大学堂。

二、稷下学宫对官学的传承与革新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田齐政权创设的官办大学堂,追根溯源,这应是对夏、商、周以来官学制度的传承,但又是在社会制度剧变、原有官学制度崩溃之后的革新与重生。

中国教育史上,官学的设置很早。在有关文献记载和传说

中,史前的五帝时期就有了学校的设置。大量的文献记载证明,夏、商、周三代的官学是发达的,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大学”之称,出现也很早。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引董仲舒的话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而至迟到商代,就有“大学”的设置与冠名了。《礼记·明堂位》就有“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且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大学”的名称及在其中致神事福活动的描述^①;结合《礼记·王制》中记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来看,商代的所谓大学,实际是培养贵族子弟习礼、习射及道德教育之所,也是敬老养老、敬神祈福之场。西周时期,官学制度继承商制,但较殷商时期更加完备,体系更全,有天子、诸侯所设之分,天子所设大学已有东、西、南、北、中五学或四学之设,科目也更多。《大戴礼记·保傅》记载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可见,大学既是天子自学,也是承师问道之所、是培养高端人才和上层统治者的地方。

综合夏、商、周三代的教育情况,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其一,三代时期的教育主要是官学,由官府举办,政教合一,教学目的是为统治者服务,招生培养对象都是面向贵族的。其二,至迟到商、周时期,已有大学、小学之分,科目既全,要求也

^① 参看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8页。